

# 雅颂形成与《诗经》的类型结构

陈 平 黄震云

**内容提要** 雅颂是天子礼乐,包括三代以来的诗歌,但都与周代有关系。商周原是西部联盟,功德攸关,因此,《诗经》整编时保存了商朝的商颂;周公享受天子礼遇,因此有鲁颂,于是颂三分为鲁商周,《诗经》就不仅仅是周诗了。周太师确立的礼乐四诗主要是雅颂诗。雅颂诗的产生时间是周公时代,为礼治仁术,逐步成为经典,以后代有续作。礼乐崩坏,风诗大量产生,孔子正乐主要是郑声一类的风诗。因此,《诗经》的形成时间是逐步的,到孔子时代最后完成,而风雅颂主要是按照历史、地位来确定的,不是根据音乐来分的。

**关键词** 雅颂 礼乐 周公 孔子 结构

## 颂诗传统与三颂的形成

《诗经》中,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由仪》为笙诗,与二南一起,不入风雅颂,故称《诗经》有 305 篇,已不是原形态。至于笙诗,只是题目文辞,实际上也就是礼乐或者舞蹈,没有写成文字,因此当初就不是声诗,也因此,具体意思我们已经不能明了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后人觉得以地言南,故南诗属于国风,又只是推测。又如宋代王质、程大昌等,则主张南只是一种乐名,可与风、雅、颂并列,故应分南、风、雅、颂四部。认识原有分歧,实际上都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,只是一般的推测。但至少可以肯定,风、雅、颂三字并不能对《诗经》进行概括,也就是说,对于《诗经》的产生、分类、构成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,还是悬疑,需要继续认真研究。

一般认为,在《诗经》中,颂是较早的作品,是具有宗教性质的史诗。具体地说,什么是颂呢?《诗大序》说:“颂者美盛德之形容,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”就是说是歌功颂德、功告神明的作品。郑樵认为,“宗庙之音曰颂”(《通志·昆虫草木略

序》),强调颂具有天子身份的规定,指出颂是宗庙祭祀时的诗歌。这样的看法大致可信。那么,为什么颂分鲁商周呢,是因为“陈三颂之者,所以侑祭也”(《通志·乐略》)。阮元的《释颂》觉得颂是一种乐舞歌辞混合起来的乐歌<sup>①</sup>,这是比较早的从文学艺术的视野对颂的认识与评论。但是,“陈三颂之者,所以侑祭也”只是就祭祀方式而言,商周为当然,之所以分鲁商周之颂,是因为周公处在实际为天子的位置,也曾经享受天子的待遇,所以有之。考《礼记·明堂位》:

昔殷纣乱天下,脯鬼侯以饷诸侯,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。武王崩,成王幼弱,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。六年,朝诸侯于明堂,治礼作乐,颂度量而天下大服。七年,致政于成王。成王以周公为有勤劳于天下,是以封周公于曲阜,地方七百里,革车千乘,命鲁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。

季夏六月,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……升歌《清庙》……纳夷蛮之乐于大庙,言广鲁于天下也。

颂就是天子之礼乐,周公享受天子待遇,所以

能享受天子的礼乐,鲁颂因此产生,而周公六年才开始制作礼乐,就表明关于周代的雅颂最早产生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。就鲁商周名称看,颂诗的产生时代就不一定是周代开始,殷商在周代前,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的《诗经》是西周到春秋中叶的诗集的说法就不可靠。又《礼记·乐记》说:

宽而静,柔而正者,宜歌《颂》;广大而静,疏达而信者,宜歌《大雅》;恭俭而好礼者,宜歌小雅;正直而静,廉而谦者,宜歌《风》;肆直而慈爱者,宜歌《商》;温良而能断者,宜歌《齐》。夫歌者,直己而陈德也。动己而天地应焉,四时和焉,星辰理焉,万物育焉。故《商》者,五帝之遗声也,商人识之,故谓之商。《齐》者,三代之遗声也,齐人识之,故谓之《齐》。<sup>②</sup>

《礼记》认为,颂中的商是五帝时代的作品或者说有关五帝时代的作品,齐是三代的遗声,就是说《诗经》中包含着三皇五帝时代的诗歌,而不仅仅是周代的作品,遗声不是影响的意思。只是我们知道《诗经》成书于周代,所以,诗云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。但是,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记载,推测《商》《齐》,皆古逸歌名,其词、曲今皆不可考,坚持《诗经》就是周代的作品,也似乎成为定论。我们认为,确实在周代以前就存在,殷商的颂就有五帝之遗声,而先王制作雅颂的原因是为了盛世颂德与政治教化,周代沿袭了这样的传统,所以,才有后来周代的兴礼乐与颂诗的形成。又《礼记·乐记》对此还有如下表述:

先王耻其乱,故制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声以道之,使其声足乐而不流,使其文足论而不息,使其曲直、繁瘠、廉肉、节奏,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,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,是先王立乐之方也。<sup>③</sup>

以礼乐治理国家是早期先民的政治理想,也是成功实践。这在古代有关的典籍中都有详细的记录。检《史记》卷四说:

兴正礼乐,度制于是改,而民和睦,颂声兴。……康王即位,简告诸侯,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,作康诰。故成康之际,天下安宁,刑错四十余年不用。……康公不献,一年,共

王灭密。共王崩,子懿王僭立。懿王之时,王室遂衰,诗人作刺。<sup>④</sup>

从《史记》的记载中我们看出,天下安宁,兴正礼乐,是周代初期的国家治理方式,这种具有教化性质的治理方式从大禹时代就已经开始了。大禹对三苗不作武功,而是舞干戚,三年三苗归顺,就是成功的例子。不仅如此,就周代而言,从古公亶父开始就是这样。又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:

古公亶父复修后稷、公刘之业,积德行义,国人皆戴之。……幽人举国扶老携弱,尽复归古公于岐下。及他旁国闻古公仁,亦多归之。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,而营筑城郭室屋,而邑别居之。作五官有司。民皆歌乐之,颂其德。<sup>⑤</sup>

由上述我们看出,在周代建国以前,三代以来,就普遍存在着歌颂传统,成德教化,兴正礼乐,治理天下的方式。运用仁爱德政的教化方式管理国家,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远古时代形成的文化传统。周代建国以来延续了这样的传统。作为周代礼乐教化的方式,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为其重要内容。《诗经》分为传统殷商的颂、周朝的周颂以及享受天子待遇的周公的鲁国的鲁颂,这就是三颂。孔子说: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,可知也;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,可知也。”(《论语·为政》)孔子认为夏商周文化有调整变化,但存在着继承,颂就是继承不断的传统之一。这就是三颂的产生与形成,但是孔子没有展开叙述。商颂的形成比较复杂,事实上流传到周代以后还经过周朝太师等人的刊定。

### 商颂的流传与《诗经》的分类结构

《诗经》确实是周代编定,但是不等于说都是周代出现的作品。《汉书》卷二二指出:

自夏以往,其流不可闻已,殷颂犹有存者。周诗既备,而其器用张陈,周官具焉。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,皆选有道德之人,朝夕习业,以教国子。国子者,卿大夫之子弟也,皆学歌九德,诵六诗,习六舞、五声、八音之和。<sup>⑥</sup>

就是说,夏代以前不是很清楚,殷商的颂诗确实

有,没有直接说是五帝的遗声,但语气上似乎还是存在的。周诗还要让国子们学习,学习的方式就是歌九德,诵六诗,习六舞、五声、八音之和,时间应该在周公六年之后。在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许多著作中有几处与《汉书》一样,称《诗经》为周诗,如《国语·晋语》、《国语·楚语》。经过核对这些诗,我们发现都是雅诗,这就是说当时人们称雅的诗歌就是周诗,当然,不代表别的诗不雅,大小雅的雅与典雅的雅是两个概念,雅诗专门指的就是周诗,这个周还只是周朝的周。又考《周礼》卷六说:

大师掌六律六同,以合阴阳之声。阳声:黄钟、大蕤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。阴声:大吕、应钟、南吕、函钟、小吕、夹钟,皆文之以五声: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;皆播以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。教六诗,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。以六德为之本,以六律为之音,大祭祀,帅瞽登歌,令奏击拊,下管,播乐器,令奏鼓鞀。大飨亦如之。大射,帅瞽而歌,射节,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、而诏吉凶。

由此可见,风雅颂、赋比兴是《诗经》的六种方式,似乎与《诗经》分类的风雅颂不同,后来人有时会混为一谈。假如六诗遗失了三诗,而且那么整齐,肯定不合道理,教六诗不能说就是有六种诗。从数量上看,305篇或者诗三百的数量与《诗经》表达一致,因此周代教的六诗应该是教学的方式,而不是说《诗经》有六类。假如说是内容,只能是风雅颂二南与笙诗,既然周诗专门指的是雅诗,那么,雅诗是根据国家,作为天子之国的周代来命名就没有什么疑问了,写作时间都在周代。而颂诗关于三代五帝,时间就更早了。按《国语·鲁语》说:

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,以《那》为首,其辑之乱。<sup>⑦</sup>

又《毛诗序》云:

微子至于戴公,其间礼乐废坏,有正考父者,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,以《那》为首。

以上资料表明,殷商时代也有礼乐崩坏的事件发生,使殷商的颂诗散失。周代整理过殷商的颂,是周太师委托正考父为之,而正考父就是孔子

的先人,所以后来孔子正乐,也是秉承家学。殷颂犹有存者与周诗既备同时,那么可以说整理殷颂与周诗的形成应该基本同时。这时的周诗不是整个《诗经》,而只是雅,或者雅颂。那么,周太师确立礼乐的史实就自然是成立的。郑玄说:“自考父至孔子,又亡其七篇,故馀五耳。”实际上这就是现在的商颂5篇,原来是12篇,经周太师、正考父去掉了7篇,周代对礼乐的重视与整理不会是亡其7篇,而应该是删除。从颂诗中有周公看,诗歌定型时间在周代周公摄政时或稍后。

对颂诗的产生,《论衡·须颂篇》解释说:

礼者,上所制,故曰制;乐者,下所作,故曰作。天下太平,颂声作。夫以人主颂称臣子,臣子当褒君父,于义较矣。虞氏天下太平,夔歌舜德。宣王惠周,诗颂其行。召伯述职,周歌棠树。是故周颂三十一,殷颂五,鲁颂四,凡颂四十篇,诗人所以嘉上也。由此言之,臣子当颂,明矣。<sup>⑧</sup>

就是说,颂就是歌颂,形容盛德,从尧舜时就已经开始,所谓五帝遗声就包括此意。赞颂是诗的传统与本质之一,而按照《论衡》的说法数量上有一定的规定,而不是随意为之。不仅天子有,周召二公也有,《甘棠》诗确实存在,属于召南,可见记载符合事实,只是表达方式不同。《论衡》说的颂是广义的,与《诗经》的颂有所不同。周代保存五篇殷商的颂是因为这些诗歌都与周代有关,而删掉的应该是无关或者不利于周人的诗。

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载季札观乐的事,一直是《诗经》研究的重要资料:

请观于周乐。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曰:“美哉!始基之矣,犹未也。然勤而不怨矣。”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,曰:“美哉,渊乎!忧而不困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,是其《卫风》乎!”为之歌《王》,曰:“美哉!思而不惧,其周之东乎!”为之歌《郑》,曰:“美哉!其细已甚,民弗堪也,是其先亡乎!”为之歌《齐》,曰:“美哉!泱泱乎,大风也哉!表东海者,其大公乎!国未可量也。”为之歌《豳》,曰:“美哉,荡乎!乐而不淫,其周公之东乎!”为之歌《秦》,曰:“此之谓夏声。

夫能夏则大,大之至也,其周之旧乎!”为之歌《魏》,曰:“美哉!沍沍乎!大而婉,险而易行,以德辅此,则明主也!”为之歌《唐》,曰:“思深哉!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!不然,何忧之远也?非令德之后,谁能若是!”为之歌《陈》,曰:“国无主,其能久乎!”自《邶》以下,无讥焉。

为之歌《小雅》,曰:“美哉!思而不貳,怨而不言,其周德之衰乎,犹有先王之遗民焉!”为之歌《大雅》,曰:“广哉,熙熙乎!曲而有直体,其文王之德乎!”为之歌《颂》,曰:“至矣哉!直而不倨,曲而不屈,迳而不偏,远而不携,迁而不淫,复而不厌,哀而不愁,乐而不荒,用而不匮,广而不宣,绝而不费,取而不食,处而不底,行而不流。五声和,八风平。节有度,守有序,盛德之所同也。”<sup>⑨</sup>

资料说明,在周代,诸侯、民间与宫廷的诗歌表达对象与内容明显不同。《左传》季札观的周乐,《邶》在《秦》前,《魏》、《唐》在《秦》后,今诗《魏风》、《唐风》在《齐风》之次,《邶》在《曹风》之次。这至少说明古今版本相异之处。而邶在前显然比较合理,因为那是周的发祥地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仍然还叫风,以与后来的雅颂、二南相区别。由此推之,十五国风,应当也包含了它们历史上传统的乐歌。始基之,勤而不怨之言就是歌唱共和的周公与召公无疑,歌颂他们的奋斗与周代创业的成就,而且秦国的诗歌中也保存了大夏的诗歌传统风韵。那么,到了雅诗,我们归纳分析就发现,大雅言开国领袖文王等的事迹,小雅则体现了周德,颂以商为名,说明基本上在商朝就已经存在,认为彼此盛德之所同,正反映了周代太师的文化思想。将季札观乐的文字与现在存在的《诗经》文字比较核对,我们能非常清楚地看出,大雅就是叙述文王、武王的功德,开国的成就。而小雅比较复杂,有写战争统一国家,也有保卫国家,还有农业生产等的艰辛与成就,就是所谓周德,比较全面。这样,我们对风雅颂的分类就比较明白了,就是以周朝为主的,按照天子国与诸侯国进行分类的礼乐。颂分三,也是按照国家及其历史成就来表达,十五国风也是按照国家来进行分类,而且,对周代没有

一统天下前在豳地的诗歌也作为风,对周公、召公二圣则称为南,乃是二公的封地在岐山之阳。这一点朱熹的《诗集传》已经作出说明。雅就是周诗,名称是为了与诸侯区别,大小之说是因为有君主与国家道德之分,所以在小雅中还塑造了君子等理想形象。这就是《诗经》的真正的实际构成,就是说《诗经》以国家地位区分命名,所以,国风过去又叫邦风,为了避刘邦的讳而改名。

至于为什么只有商颂能够保存下来,除了商对夏代的文化继承,而夏代文化不可考以外,应该还有以下的原因,主要是:(1)与周代迅速封宋给殷商后裔用意一致,但又必须为周代政治服务,所以进行了必要的校理;(2)殷商与周具有发展连续性,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;(3)周商皆是女系亲戚,从三代以来就都是西部联盟。所以,商颂、小雅中都提到大禹治水,但是接着就是说公刘教民稼穡,表明其都与周有关系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六年》记录蔡太师子朝一节,反映了人们对商颂的理解与评价:

《商颂》有之曰:“不僭不滥,不敢怠皇,命于下国,封建厥福。”此汤所以获天福也。古之治民者,劝赏而畏刑,恤民不倦。赏以春夏,刑以秋冬。是以将赏为之加膳,加膳则优赐,此以知其劝赏也。将刑为之不举,不举则彻乐,此以知其畏刑也。夙兴夜寐,朝夕临政,此以知其恤民也。三者,礼之大节也。有礼无败。杜预注:“言殷汤赏不僭差,刑不滥溢,不敢怠懈自宽暇,故能为下国所命为天子。”

《商颂》反映商汤以礼乐治国,是其美德的缩影,也是周代对前代文化继承的表现,符合周代文化理想,一定程度上有以史为鉴的印证作用。

### 礼乐崩坏与孔子正乐

颂诗的产生,关系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与礼乐,已经没有疑问。根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:“古公亶父复修后稷、公刘之业,积德行义,国人皆戴之。……邠人举国扶老携弱,尽复归古公于岐下。及他旁国闻古公仁,亦多归之。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,而营筑城郭室屋,而邑别居之。作五官有

司。民皆歌乐之，颂其德。”<sup>⑩</sup>周朝本民族也有这样的传统。又考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说：

召公之治西方，甚得兆民和。召公巡行乡邑，有棠树，决狱政事其下，自侯伯至庶人，各得其所，无失职者。召公卒，而民人思召公之政，怀棠树不敢伐，哥咏之，作《甘棠》之诗。

《笺》云：“召伯听男女之讼，重烦劳百姓，止舍小棠之下，而听断焉。国人被其德，说其化，思其人，敬其树。”颂诗是为歌颂君王美好德行而产生的。显然，对召公这样的人物，虽然作的是颂，但名称就不叫颂，而叫歌咏，表明颂是天子礼乐，区别还是很明显，所以诸侯国家或者大臣都不能这样命名。颂诗除了歌颂的功能外，还有警戒的功用。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：

太康尸位，以逸豫灭厥德，黎民咸贰。乃盘游无度，畋于有洛之表，十旬弗反。有穷后羿因民弗忍，距于河。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，偃于洛之汭。五子咸怨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。<sup>⑪</sup>

在这里，《五子之歌》述大禹的美德以对失德的太康进行警戒。这进一步说明颂诗兼有歌颂和警戒两方面的功能。颂诗产生的时间很早，具体难以十分清楚，但是编定时间在周公六年，其截止时间仍然可考。《史记》卷四说：

兴正礼乐，度制于是改，而民和睦，颂声兴。……康王即位，偏告诸侯，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，作康诰。故成康之际，天下安宁，刑错四十余年不用。……康公不献，一年，共王灭密。共王崩，子懿王僭立。懿王之时，王室遂衰，诗人作刺。

周公时代制作礼乐，至康王礼乐崩坏，至共王崩，王室遂衰，诗人作刺，即作风也。所以风为后起，而且《诗经》与《尚书》一样都对三代以来的文献有所保存，这也是文王以来一贯的仁术思想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亦有记录说：

周公相成王，王道大洽，制礼作乐，天子曰明堂、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。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怀柔百神，咸秩无文。五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。

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，大夫祭门、户、井、窻、中霤五祀，士庶人祖考而已。各有典礼，而淫祀有禁。后十三世，世益衰，礼乐废。幽王无道，为犬戎所败，平王东徙洛邑。

在懿王时代，世益衰，礼乐废，所以，《诗经》的政治功能逐步丧失。到了汉代，学者们依然看重礼乐的作用。《新语·道基第一》说：

民之畏法，而无礼义；于是中圣乃设辟雍庠序之教，以正上下之仪，明父子之礼，君臣之义，使强不凌弱，众不暴寡，弃贪鄙之心，兴清洁之行。

又《新语·无为第四》说：

道莫大于无为，行莫大于谨敬。何以言之？昔舜治天下也，弹五弦之琴，歌南风之诗，寂若无治国之意，漠若无忧天下之心，然而天下大治。周公制作礼乐，郊天地，望山川，师旅不设，刑格法悬，而四海之内，奉供来臻，越裳之君，重译来朝。故无为者乃有为也。

对后来的乱世，他们认为是礼乐崩坏的原因。《新语·道基第一》：

后世淫邪，增之以郑、卫之音，民弃本趋末，技巧横出，用意各殊，则加雕文刻镂，傅致胶漆丹青、玄黄琦玮之色，以穷耳目之色，极工匠之巧。<sup>⑫</sup>

又《礼记·乐记》：

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，比于慢矣。桑间濮上之音，亡国之音也，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

因此，自孔子以来，就大力倡导赞美三代以来的礼乐文化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说：

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路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》《舞》。放郑声，远佞人。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<sup>⑬</sup>

从康王开始，礼乐崩坏，所以大量的风诗产生，这些风诗，据说后来经过孔子的整理。王充《论衡·须颂篇》说：“（孔子）自卫反鲁，然后正乐，雅、颂各得其所也。”按照王充的说法，好像孔子正的是雅颂，实际上他的表达不全面。就像《论衡·

须颂篇》把二南说成是颂一样,叙述的角度不同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:“孔子之时,周室微而礼乐废,《诗》、《书》缺。……孔子语鲁大师:‘乐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,纵之纯如、嘒如、绎如也,以成。’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,取可施于礼义,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周之盛,至幽厉之缺,始于衽席,故曰:‘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,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,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,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’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。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,以备王道,成六艺。”<sup>④</sup>

这一堆材料的含义比较复杂。孔子的正乐与季札的观乐的内容有所不同,那么季札所说的内容与现在的《诗经》比较,也可以看出彼此在内容上的区别,就可以知道不完全是同一回事。季札时代,是另一个《诗经》的本子,风诗也有,但后来又有了大量的风诗。孔子正乐目的就是以备王道,所以,王道不行的当时就不可能再产生雅颂诗。显然,他的正乐不是雅颂诗,而是风诗,因为文献说得很清楚,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,显然雅颂是孔子正乐的标准,在周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了,以后有些补充,但到孔子时代完全定性定型,成为他正乐的典范与目的,所以孔子正的是风诗无疑。雅、颂各得其所指的是雅颂不再与风诗混为一谈,回到崇高的地位上,而决不是整理雅颂。不然,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就说不通,而且孔子对诗云非常敬重,《论语》中 20 多处提到《诗经》,都是对待经典的态度。又言之,孔子不能个人重新编定周诗。至于之间雅颂是否被俗乐浸润,尚不很清楚,但孔子恶郑声之乱雅,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如上述,他的正乐,得到鲁太师的同意,自然也是典雅之行为,鲁太师不会冲击周太师的权威。那么,问题是人们大概是误会了司马迁的记载。其含义连贯应该是“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古者《诗》(应该说是风诗)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……(完成的)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。”在礼乐崩坏以后,到春秋时期产生了桑间濮上之音、郑卫之音,大量风诗产生,而

其它国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,因此孔子正乐。太平盛世,人民对君王歌功颂德,祭祀祖先,雅颂声作,因乐而为诗。衰废之世,人民抒发乱世、亡国之音,作刺,因诗而为乐,风声起。中圣就是周公,因此颂诗的全面整理编定就是周公时代的事情,而具体办事主持的是周代的太师。对于具体的年代,《礼记·明堂位》说:

昔殷纣乱天下,脯鬼侯以饷诸侯,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。武王崩,成王幼弱,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。六年,朝诸侯于明堂,治礼作乐,颂度量而天下大服。七年,致政于成王。成王以周公为有勤劳于天下,是以封周公于曲阜,地方七百里,革车千乘,命鲁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。……季夏六月,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……升歌《清庙》……纳夷夏之乐于大庙,言广鲁于天下也。

总之,周公兴礼乐而辅助成王,使典礼有序、天下太平,所以能够广鲁于天下。颂是帝王享有的礼乐方式,雅是周代君主与国家的成就体现,颂出自周公六年,因此有周太师正商颂、制五篇的事情发生。雅也在周公时代。以后历代雅颂都有补充调整,风诗整体后出,其编定者应该就是孔子,时间在孔子返鲁之后。编定的原因就是孔子自己说的“恶紫之夺朱也,恶郑声之乱雅也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也所以,孔子正乐,只是风诗,而且以针对郑卫之音为主。

#### 雅颂诗的构成关系消失与风雅颂的统一

三代以来,中原文化基本上都是中西部文化融合的结果,然后再向四方扩展。黄帝、尧、大禹都是通过婚姻形式东西部结盟,到尧统一天下后,为了稳定局面,还是采取婚姻方式,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,实现垂直联盟,所以,基本上都有姻亲关系。周与殷商也是这样,他们原来就是西部联盟。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说:

其四曰:“明明我祖,万邦之君。有典有则,贻厥子孙。关石和钧,五府则有。荒坠厥绪,覆宗绝祀。”

《五子之歌》说明周与殷祀同系。周公辅助成王时,代王摄政,封在鲁国,相当于天子,所以有鲁

与周的国姓也是一样。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说：“鲁有天子礼乐者，以褒周公之德也。”颂诗涉及到夏商的原因，是由于商周都是西部夏族的后裔。《周颂》的年代，正代表着武、成、康、昭的西周盛世。郑樵说：“颂有在武王时作者，有在昭王时作者。必以此拘于诗，所以多滞也。”最早的如《清庙》、《维清》诸篇，成于武王时，最迟者如《执竞》为昭王时作。可见《周颂》的形成时期，前后有一百余年。最初编定是周公的六年，最后的时间就是13代以后，到康王结束。

《鲁颂》与周颂不一样，随着周公的死，鲁颂就没有了，广鲁于天下不是说广鲁于永远，因此鲁颂是前7世纪的作品。关于《商颂》，照《毛诗序》的意见，《商颂》是周代乐官保管的殷商乐章。近代魏源、王国维诸人从地名、国名以及文句的形态方面研究，论证了《商颂》是宋人的作品。其准确时间难断定，大致说处于前八、七世纪之间。因此它们产生的时代，比起《周颂》要晚得多。但是，假如是这样，殷商的后代就有造反的嫌疑了，毕竟颂是天子之乐。可以说宋人保存了其祖先殷商的诗歌，但是不能说他们创造出商颂，尽管如此，最后还是被删改。《左传》所谓“殷民六族”、“殷民七族”及“怀姓九宗”，都是殷之遗民或原属于殷人的种族奴隶，现在一转身又成为周人的种族奴隶了。工作是照旧，即所谓“启以商政”或“夏政”，而必须遵守周人的法纪或戎人的法纪，即所谓“疆以周索”或“戎索”。在这些种族奴隶之外还有大批的“顽民留在洛邑，替周人从事生产”<sup>⑤</sup>。所以，他们不会作颂，也没有这个资格，雅颂在13代以后就

已经不再产生，代之以风诗，最后孔子正乐，形成现在的《诗经》。之所以选了305篇，主要是为了符合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，3、5都是阳数，5有九五之尊的意思。后来的《唐诗三百首》选了310篇，比《诗经》少1篇，可见，在后人的眼中，大唐盛世也是不能与周相比的。因此，《诗经》是帝王文化的代表，也是礼乐治国的经典，对于其中邦国的刺诗风诗，经过孔子的整理，也成了温柔敦厚、哀而不怨的风情正声，至此风与雅颂达到统一，而后来的诗只是辞或者歌语之类。纯粹的诗是东汉以后的事，成为文学概念了。

①参见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42页。

②③《礼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21~222、220页。

④⑤⑩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中华书局1959年版，第114页。

⑥班固：《汉书》，中华书局，第1038页。

⑦《国语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216页。

⑧杨宝忠：《论衡校笺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646页。

⑨王守谦等译：《左传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031页。

⑩李民、王健注：《尚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92页。

⑪王利器：《新语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1页。

⑫杨伯峻译注：《论语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164页。

⑬王利器注：《史记》，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1423页。

⑭郭沫若：《奴隶制时代》，《郭沫若全集》第三卷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26页。

作者简介：陈平，1971年生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；黄震云，1957年生，文学博士，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。

〔责任编辑：刘蔚〕